

调查研究 毛泽东开展的五种方法

□ 徐中远

毛泽东是我们党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多次说过：“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的调查研究与众不同，具有独特的方法。

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1943年冬，鲁中区委书记江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见到他后，询问起山东和沿途见到的群众生活情况。江华汇报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毛泽东因此教导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了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江华晚年由衷地说，毛主席的这番教导使他受益终身。

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了遂川县城。城里家家户户关着门，没有一个人影。当时小街上住着一个老头，他的儿子和媳妇听信白军的谣言，都进山藏起来了。这个老头因腿部伤肿，来不及走，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已经两餐没有饭吃了。门被推开了，有人走近他轻声轻语地问：“老伯，你好哇！”老头诧异地睁开双眼，问道：“你是什么人？”毛泽东亲切地说：“大伯，我们是工农革命军。”他一边说，一边观察老头的神色与腿伤，发现伤口红肿化脓，便叫一个战士弄来一撮盐，泡水给老头洗伤口，又叫一个战士拿来一小袋米，为老伯熬粥。老伯非常感动，便把满腹话语向毛泽东倾诉，并表示要把藏在山上的儿子和媳妇叫回来，把左邻右舍喊回来。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到沙洲坝。一天傍晚，毛泽东看到一位老伯从池塘里挑来的饮用水很不干净，并了解到多年来村民们吃水一直很难。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便到村里村外察看，思考着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子里的办法，然后组织干部战士用大楠竹做材料，铺设了一条简易的水管，暂时解决了饮水的问题。之后他又继续带着区乡干部和红军战士，跋涉几十里去寻找水源，亲自勘定了章义坑、峨公坑等几个水库坝址。同时又从民众生活长远着想，决定在村里打井。后来乡亲们并在井台上竖起一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纪念碑。

通过身边警卫人员搞调查研究。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庭院里接见了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毛泽东亲自给他们下达了一项任务：增加一项调查工作。为了使警卫干部和战士充分认识回乡调查的意义，毛泽东进一步阐述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我通过你们，你们通过农民，把情况了解上来，这就是搞调查。

遵照指示，警卫部队把干部战士回农村调查当成一项重要工作，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回乡探亲搞调查。回京以后，毛泽东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认真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并进行耐心的指导。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鼓励警卫干部和战士多同家里和亲友通信，把它作为调查的一种方式，并要求“把回信拿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通过这种办法，既详细地了解了农村和农民的情况，也提高了警卫干部和战士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帮助他们很好地进步成长，可谓一举两得。

从阅读研究报纸和史籍中发现重要重大问题。长征途中，毛泽东千方百计地寻找报纸，在—张旧报纸上发现了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消息，因此决定将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从部队中挑选一批优秀干部出任外交官。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了即将出国赴任的黄镇、姬鹏飞、韩念龙等人。毛泽东希望“将军大使”不辱使命，并叮嘱：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要“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还提醒他们：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接着，毛泽东举例说：比如，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

1970年12月，李德生受命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此，毛泽东专门同李德生谈话，对他说：“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輿记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顾祖禹为清朝初年人，所作《读史方輿记要》是研究中国军事史、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与阅读和研究报纸上的消息—样，毛泽东要李德生通过阅读和研究《读史方輿记要》，了解认识北京和华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

从群众的冤屈、牢骚的言论中寻求需要调查研究的问题。—些群众在生活中蒙受冤屈的时候，便会说—些过激的话、牢骚的话。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毛泽东都能认真对待，冷静分析，从自身方面查找原因，通过调查研究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分清是非，如果错了就立即改正。

1941年6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被雷电击死。同时，—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亡，这个农民逢人便说关于毛泽东的牢骚怪话，非常刺耳。有人把情况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没让保卫部门去追查说这话的人，而是深刻反思工作中到底有哪些失误和过错，竟然激起群众如此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后来他派人专门去群众中调查了解，很快就弄清楚事情的真正原因。原来是陕北不到—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年就要征20万担公粮，有的老百姓实在负担不起，因而产生了不满情绪。毛泽东得知原因后，马上与有关方面研究商量，建议征粮减到16万担。同时，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百姓负担。消息很快在陕北各地传开了，广大群众拍手称赞。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关心备至，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习惯把向人民群众作调查的过程当作是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的过程。

1952年10月，毛泽东到河南考察。—位老汉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这盐碱地有法治吗？这黄河水害有法治吗？”之后，毛泽东就把治理黄河的事情时常挂在心上。仅从1953年到1955年，他3次听取河南省委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关于治理黄河情况的汇报，提出了许多带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意见。

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办公之余，他爱到海里去游泳。有一天，毛泽东游得很远。当听说海上有—条渔船时，毛泽东上了船，不等擦身上的海水便与老渔民聊上了。

老渔民没有认出毛泽东。毛泽东和老渔民都很高兴，聊的话题也很宽。老渔民因要去卖掉今天捕到的螃蟹，没有过多的工夫陪毛泽东聊天，说着说着便要走了。

毛泽东追着喊：“多聊聊，多聊会儿我把你船上的螃蟹全买了。”

老渔民有些不相信地说：“你别拿我开心了。”

毛泽东—本正经地说：“老同志你别不相信人哪，你跟我—道走么，—手交钱—手交货。”

老渔民这算吃了定心丸：“行，我跟你走。现你唠嗑什么都行。”

毛泽东问：我就要听听你那村互助组为啥不团结？

老渔民谈得真真切切、有声有色。上了岸，老渔民把螃蟹—下子全倒下了，拿到钱，毛泽东和他握手告别。老渔民边走边说：“今天交了好运。”

但他始终不知让他交好运的究竟是谁。（作者系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

全歼日寇一个精锐大队的著名战例

——梁山战斗纪念碑碑文敬读

□ 孙现富 陶登贺 王 峰

在山东省梁山县革命烈士陵园的松柏林中，矗立着一座标志性建筑——梁山战斗纪念碑。1992年，为纪念该战斗胜利53周年，当地政府特立此碑。纪念碑碑身不高，庄严肃穆，就像一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记录着一段英勇的抗战记忆。背面的碑文详细记录了这场战斗经过，全文如下：

梁山战斗系我军继平型关大捷后以同等敌人的兵力和劣势装备全歼日寇一个精锐大队的著名战例。此次战斗，震慑寇敌，鼓舞军民，“集总”嘉喜，国人称颂。公元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日寇三十二师团以步兵炮兵各一个中队并纠集伪军四百余人，自汶上出动，经靳口直扑梁山。是时，我一—五师东进支队正转战于此，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谋划采取袭扰以诱敌、设伏以制敌、合击以歼敌的战术全歼日寇。二日上午，我军于王府集村西袭扰寇敌，敌误以为“土八路”，继续西犯。九时许进抵马振扬村，或抢掠鸡鸭，或赤身休息，或潜塘洗澡，骄态毕露。我预伏部队乘敌不备，突然出击，旋即佯装退走独山。日酋长田敏江率部沿梁山南麓追至独山村，陷入我预歼伏击圈。黄昏时分，在梁山抗日群众配合下，杨勇的独立旅—团和师部特务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南、西三面合击，将敌压缩至独山南坡两个车马店及十余座石灰窑洞内。敌死伤惨重，鸣炮求援，伺机突围。翌日二时许，我军将敌分割包围，几经激战，毙长田以下四百余名，俘敌二十四名，缴获全部武器战马辐重。梁山战斗是抗日战争又一彪炳史册的辉煌胜利。伟哉，卫国英名垂千古！壮哉，民族精神世永存！适值庆祝梁山战斗胜利五十三周年之际，特勒石志之。

碑文生动展现了八路军将士不畏强敌、敢打硬拼、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英雄气概，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战无不胜的勇气和力量，读

来让人荡气回肠，备受振奋和鼓舞。

联欢会变身战斗动员会

1939年8月1日，八路军115师正在梁山孟家林举行军民联欢会，庆祝建军12周年。上午8时许，部队接到侦察兵报告：驻山东日军第32师团400余人，正向梁山一带进犯，对鲁西南进行示威性“扫荡”。

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根据敌情作了分析，认为虽然这股日军装备精良、实力雄厚，但骄狂轻敌，孤军深入，地理生疏，且敌友军难以策应求援；我115师师直特务营和杨勇所率独立旅1团3营，加上可参战的地方抗日军民，参战人数基本与敌相当。虽然我们装备落后，但正规部队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部队，并且地形对我有利。当时又是盛夏，梁山南部都是青纱帐，有利于隐蔽运动。另外，敌人不知道梁山有我主力部队，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陈光、罗荣桓认为：“这是送上门的敌人，要坚决吃掉！”于是，联欢会变身战斗动员会，命令独立旅1团从40里外的驻地赶来梁山附近，做好战斗准备。

日军渡过运河后便进至馆驿，刚刚准备驻扎就受到游击小分队袭扰。见我军火力不强，没当回事，架起野炮漫无边际地乱轰—气，继续西进。就在敌人快靠近梁山时，我特务营2连、4连和骑兵连，突然斜插过来，冲到敌人侧面又是一顿袭扰，没等敌人还手，又迅速撤走。直到这时，敌人还没有在意，于是停止前进驶进了梁山脚下的独山村。岂不知，八路军的一张天网早已悄然展开，等待敌人的到来。

歼灭战打出八路军高士气

战斗在8月2日夜打响。骑兵

连从独山西北角冲进村子，10连从西南声东击西……当时，独山顶上驻了一个日军班，我军很快冲上去占领制高点。日军哪肯罢休，开始组织反扑。日军两个小队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一次次向独山高地反击。

“看似占据地理优势，但我们装备太差，敌人光大炮就3门，他们在炮火掩护下发起6次冲锋，都被打退了。敌人第7次攻击时，我们阵地上牺牲了很多战士，只剩下不到30人了。有的烈士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没退缩，没有子弹就搬石头砸，都拼急了！”在《梁山烽火》的一段口述历史中，仍能感受到战斗的激烈和残酷。

紧急关头，686团11连急行军赶到，在两面夹击下，打退了日军第7次反击。随后，我10连坚守独山高地，11连突入独山村，切断敌人退路。敌人把残余部队集中起来，龟缩到独山南坡几座石灰窑等建筑内，架起机枪继续进行顽抗。

8月3日清晨，歼灭总攻开始。我军集中十余挺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向残敌猛烈射击。除了有数十个日伪军侥幸逃脱外，其余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活捉。

梁山战斗不但全歼日军一个精锐大队，还俘敌24人，缴获武器枪支若干、战马50余匹。这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上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又一次著名的歼灭战，创造了兵力与日军大致相等、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被誉为“模范歼灭战”。

胜利士气迸发抗战激情

梁山歼灭战，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山东给日军—次十分沉重的打

《红色中华》如何密切联系群众办报

□ 李荣梅

《红色中华》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该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1937年1月停发。5年多的存续期间，共发行324期。其发行量初期为1万份，最多时达4万余份，是苏区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报纸。

内容：让尽可能多的群众“写群众”。该报拥有比较健全的通讯网，特别是1933年1月后，省与县一级的地方党团政府与工会、红军总政治部与各军区政治部都配有一名实际的通讯员。他们搜集各种实际工作材料与消息，将其写成通讯稿并寄到报社，而且组织与教育在他们领导下的工农通讯员，发展通讯网到群众中去。1933年7月13日，红中编委向所有的读者呼吁：每个读者都做我们的通讯员！

扩红运动、群众支前及军民对敌斗争是武装斗争宣传的基本内容。1934年9月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极为艰难之际，报纸发布“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的通告，并在其后报道了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动员以及四个模范女同志踊跃承担草鞋任务的事迹。这“唤起了工农千百万”，不到1个月，20万双草鞋募集完成。关于土地革命，报纸特别注重向干部群众宣传解释根据地土地政策。《奇怪的河田乡分田》在批评河田乡政府工作人员分田不彻底后指出了分田的7项方法原则，《反对侵犯中农》则鲜明指出了瑞金各区分田中存在的“反中农以及过早地消灭富农”的错误倾向。此外，报纸注

重反映根据地建设的各方面情况。针对苏区多数工农群众对政治生活中—些概念的无知或误解，报纸结合实例对选举权、被选举权、代表大会、联席会议等概念、程序进行解释，有效促进了苏区的民主政权建设；《怎样消灭禾虫？》《学习公略县植棉经验》等紧贴群众生产需要，有效指导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天花预防法》等积极宣传防疫知识，守护群众的健康。

形式：让尽可能多的群众读得懂、听得懂。文风朴实且鲜活生动。该报的行文用语直白朴实、自然通俗，而且文稿常采用比喻、反语等修辞手法和祈使句、感叹句等句式，既易懂又不失力量。《上前线去！》写道：“亲爱的新同志背着毯子干粮袋，英勇地、满脸笑嘻嘻地从讲台右旁的大道上……有的在忙着打‘中山式’的旧军衣—擦，—面穿上了红校尉发下来崭新的列宁装，有的在看‘告新战士书’，有的在疯狂了一样的跳，笑。”质朴的语言生动反映了新战士火—般的革命热情，感召力跃然纸上。

栏目设置丰富且严谨。从第4期起，该报开始设置栏目，除“专电”“社论”“要闻”“消息”“文告”“苏维埃建设”“来电”“通讯”等逐步完善的常规栏目外，还有揭露、批评苏区落后现象的“突击队”“铁锤”等专栏，有报道先进集体和个人的“红板”“红匾”专栏，有解答群众疑问的“问题与解答”“法令解释”等栏目。这些设置满足了群众多元化的信息需求。

宣传形式多样且接地气。该报

通过漫画、歌谣、图表等多种方式来承载内容，使群众更易理解接受。漫画《在无产阶级铁锤下的骷髅》描绘了一名红军战士拿着—个铁锤砸向—堆骷髅，骷髅上分别写有“官僚主义”“腐化”“反动派”等字样，这和文章《贪污腐化分子滚出去！》搭配，实现了图文并茂，生动直观。

发行：让尽可能多的群众能见到报。该报创刊之初就建有发行科，专门办理报纸的发行业务。几个月后，发行科扩大为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负责苏区书籍和报刊的定价、发行以及推销代派。其间，总发行部依据实际制定了多种推销优惠方式，促进了报纸的发行。1933年四五月间，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被划归到中共中央局发行部管理领导，这就从组织形式上强化了党对发行工作的领导。此外，邮政发行渠道的开通和邮政网络的健全也大大促进了报纸的发行。

该报的通讯员不仅是稿件提供者，读者也不仅是报纸的阅读人，他们还是报纸发行的重要群体和渠道。报纸创刊100期之际，邓颖超对改进发行工作提出了建议，认为应充分发挥每个通讯员和每个读者的作用，使之成为扩大与发展报纸的前哨尖兵。数据统计，1934年，该报的通讯员队伍达400多名，在苏区基本达到全覆盖，从而成为重要的发行力量。创刊300期之际，该报提出各通讯员要帮助各发行分所建立报纸发行网，同时进一步号召全苏区的人民为本报进行通讯、设置满足了群众多元化的信息需求。

公共阅读：让尽可能多的群众能够有效“读”报。在中央苏区，



击，为巩固鲁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打开了新局面。萧华写诗赞道：“黄河滚怒涛，梁山烈火高。青纱好伏击，夜战逞英豪。全歼来犯敌，斩获数门炮。军威震齐鲁，壶浆迎满道。”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修撰抗战历史时，罗荣桓要求把“梁山歼灭战”放在首要位置。他说：“没有这次的大胜，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正是这次战斗，八路军指战员认识到平原游击战是完全可行的，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梁山周围老百姓也被胜利所鼓舞，纷纷为八路军送来西瓜、猪肉和鸡蛋等慰劳品，更是涌现出“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兄弟相争”上战场的动人场景。仅半个月时间，梁山、东平、鄄城、菏泽等地就有3000多名热血男儿参加了八路军。而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仅梁山牺牲的烈士就有800多名，其中396人没有留下名字。



一方面受报刊印数及群众经济条件所限，—些群众买不到或买不起报；另—方面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能实现自主阅读。由此，建构公共阅读成了该报的积极探索。

设置公共阅读的场域。该报的公共阅读场所比较多样，其中，俱乐部、列宁室是最重要的场域。政府机关、红军连队、大的工厂企业、地方工会、列宁团校、苏区农村等单位都没有俱乐部和列宁室。在红军连队的列宁室里，墙报栏中摆放有《红色中华》等报刊，战士们或是自己阅读或是听别人念；在列宁团校的列宁室里，学员们吃过晚饭三三两两到这里读书看报；在赣东北苏区的农村，广大农民喜洋洋地聚集在俱乐部和列宁室里唱歌、演戏、读报、识字。

创设集体读报的方式。集体读报的组织是多样的，包括读报（小）组、读者会、读报团、读报班等。才溪乡读报团，逢圩日读，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红军中的读报组则利用行军时的休息时间、驻扎时的午饭后以及作战间隙读报；列宁小学的读报组白天到集市读报，晚上到夜校读报；等等。实战中，读报人往往不是死板地念读，而是抓住核心要点，通过“讲”的方式传达给听报人，有的还没有问答环节。这种方式对听报人很有吸引力，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的听报员高兴地表示：“回去定要传达，后日不要喊，吃了午饭一定要来。”公共阅读促进了该报的大众化阅读，提高了工农兵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实现了群众同党和政府的互动。